

西山论道集

陈传席 = 著

博士生导师学术文集系列丛书 ①



▲ 辽宁美术出版社

西山论道集

陈传席=著

博士生导师学术文集系列丛书 ①



 辽宁美术出版社

© 陈传席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山论道集 / 陈传席著.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3.9
ISBN 7-5314-3068-1

I. 西... II. 陈... III. 中国文化 - 研究 IV.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316 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印 刷 者: 辽宁美术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出版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申虹霓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王恩国

定 价: 48.00 元

邮购电话: 024-23419474
E-mail: lm1945@yahoo. com. cn
<http://www.lnpgc.com.cn>

陈传席教授简介



陈传席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曾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院）明清绘画联展。1986年赴美国从事明清中国画研究和考察美、日、英所藏中国古代艺术遗迹。回国后，从事艺术史和文学史研究，已出版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大陆版，台湾版）、《中国山水画史》（第七版）、《弘仁》、《明末怪杰》、《中国紫砂艺术》、《中国绘画美学史》（上、下）、《精神的折射》、《悔晚斋臆语》、《现代艺术论》、《陈传席文集》（5册）、《陈传席画集》等36部，发表艺术性文章600余篇。据《美术》公布，陈传席的艺术史论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已指导16个国家的留学生和高级进修生，同时教授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其散文作品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大系》；其绘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绘画年鉴》。曾在莫斯科举办个人画展，苏联画报作过专题报导。



◎ 陈传席教授近照



◎ 陈传席在写作



◎ 陈传席和他指导的意大利留学生



◎ 陈传席（左三）浏览漓江时与广哈孜·艾买提（左一）、刘国辉讨论艺术



◎ 陈传席在华盛顿广场



◎陈传席在中国美术馆 左起：刘国松、陈传席、刘文西、于志学

自述

很多读者和编辑希望我谈谈自己的治学道路和经历。十年前《名人传记》等杂志就多次约我写自传，或请一位作家为我写传记，我都拒绝了。我的经历中有很多阶段和事情目前还不想讲，大约等到我90岁之后，可能会写出来。这里只讲几段已为众人所知的经历。凡是我不愿讲的便一跃而过。所以有简有详。

我的父亲最反对我画画，但主张我把字写好，他自己的书法很有功力，格调很高，比现在的著名书法家写得好。父亲是个传统文人，解放前在成都上大学，通古文，外文，后投奔延安，途中为阎锡山的部队阻挡，遂回本乡，组织抗战。后参加东撤，解放后遭政治迫害，郁郁寡欢，整日闲居，仍订阅多份报纸，关心国家命运。在他眼中，绘画不过是雕虫小技，无益于国民。古人说“壮夫不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直这样认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华盛顿、拿破仑都不以画为业。丘吉尔、希特勒、宋徽宗会画画，皆是业余。丘吉尔如果以绘画为专业，他就没有今天的地位了。宋徽宗耽于绘画，当金人虎视眈眈，宋朝江山岌岌可危时，他还在研究孔雀升墩先抬左足还是先抬右足。结果，国也亡了，自己和皇后皇妃们都做了俘虏，受尽凌辱之后，死于五国城。前时我到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看了一次，毛泽东读书时，成绩很优秀，唯有图画课是零分。他每到图画课上，在画纸上写上“毛泽东”三个字，然后交白卷。当时图画课画的是静物，他说画这些东西对国家没有益处，所以他一笔也不画。孔子早就讲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为终身奋斗的目标，“德”可据，“仁”可依，独“艺”不可据、依，更不可志，只可游之而已。但文化大革命那个黑暗年代，人妖颠倒，还有什么“道”可志呢？即使

不知道“马斯洛定律”的人，也知道人生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何以为生呢，我只好以为人画像，用油画画“红太阳像”，帮人搞大批判专栏为生，也确实赚了不少钱。我的父亲一见我背着画箱，就十分痛苦，多次劝我不要再画了，好好读书。但我不画就无法生存，父亲也只好听之任之。老实说，十年文革虽然误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我还是读了不少书。画油画只能在白天，夜晚便读书，不过这样读书只是兴趣使然，和正规教育大差庭径。

我少时读经，读史、诸子百家、释老歧黄、诗词小说、古今中外，记胜之书，见到就读。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书，我都是在小学时就读完的。当时就对着注释读《诗经》、《论语》等。我们家族中没有人能画画，我接触绘画是在小学图画课中。我画得最好，每次画画，我得分最高。有时我的画被作为范本贴在教室内。不过那时也没有想过要当画家。

因为我父亲遭到政治迫害，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11岁便离开家乡，离开江苏省，到安徽去读书了。我从不向家里要钱。走路途中，我喝溪水，吃路边苦瓜及林中桑椹等充饥；在学校里，我靠拔草、扛砖头为生，三年大饥饿（一般被称为“自然灾害”），我几乎没有吃过粮食。在皖北的学校里，吃的是“五好面”——五种树叶、山芋秧等磨成的粉。那时安徽饿死了很多人，我也曾多次饿昏，但没有饿死，还长成很高的个子，但很瘦弱。所以，当时我写了一首词《减字木兰花·咏迎春花》，第一句就是“小园篱畔，有一枝柔条弱干。”其实就是自况。那时，只要不饿得昏倒，便读书不止。初中毕业之前，我各门功课都最优，语文（包括作文）、历史、地理、美术，不用说了。我的数学更好。那时老师们断定我将来会成为大数学家，而且我还是业余合唱队队长，能吹箫笛。自学旧体诗词。当时一位图画老师水平很高，古文诗词皆通，但我在初中时基本上没有学过画，只是凭一时兴趣胡乱涂抹，但学问却下了不少工夫，读了很多书。现在回忆，十来岁时读书最为重要，是一生的基础。当时考高中最难。一个县有二十多所中学都是初中部，每校皆有四个初中班，但全

县仅有一个高中部，只三个班，大约三十人才能有一人考取高中。我考上高中后正值猛长身体时，食量很大，但却没有饭吃，每天饿得发昏，那时自然灾害期已过，别同学都不再挨饿，独我离开家庭后便不再回家，也不向家里要钱，几乎每天都饿得眼前发黑，书也读不下去，课也听不进去。下午课外活动，别同学去打球练单杠，我也没有力气，只好在花园旁坐坐。这是我一生最灰暗的时期。

这时候，我认识了王天铎先生。王先生原是一位儒将，据说蒋介石曾很器重他，把他安排在傅作义的参谋部，傅作义起义后，他率一团人冲出北京城，结果被围城的解放军打伤了大腿，作了俘虏。后来被他的一位朋友保出来，安排在泗县中学教书。他自刻了一方印，曰：“伤股军师作画师。”每日以作画、写字、吟诗、治印为寄。当“阶级斗争”紧张时，他作为“历史反革命”，只能在校园内浇花植树，不准许他再教书。他精通诗词、书法、绘画、篆刻、武术，也通医道和园艺。据说他是清道人的学生。我当时因不知道清道人是谁，也没有问过他。我看他浇花很吃力，便帮他提点水，他便给我讲这些花叫什么名字，什么特点，入药有什么用处，有哪些诗词咏之，有哪些画家画过，等等。我便把我写的诗词拿给他看，他说很好。其中几首，他还抄下来，尤其是我写的《减字木兰花·咏迎春花》，他说应能传世。从此，我便跟他学旧诗词。他看我身体太弱，便劝我学画、学书法，用以养生。我跟随王先生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受先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诗词、古文、书法、绘画、医道、武术都受过王先生的影响。而且，王先生的思想也属于“明智”一派。他说，从现在的形势看来，画画要有用，必须画人物画、画工农兵，你还要学些洋画。在他鼓励下，我又随杨剑华先生学素描和油画。但是读诗学书法还是随王先生。

199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先生因为历史问题，自然受到冲击。抄家时，发现他保存当年蒋介石会见他的照片，以及他本人怀念蒋介石的诗。还有当年他和国民党将官们互相酬答赠送的诗画作品。于是王先生被批斗、关押。我当时也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因13岁时写的《减字木兰花·咏迎春花》词最后一句“一驾东风，便

领千花万卉红”。被革命左派分析为“一旦得势，便会率领千军万马向党进攻”。我也就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反党老手”。大字报铺天盖地，揭发我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行为。又抄了我的床（因当时仅有一床），抄出我平时写的很多诗词和日记本，一一分析，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大字报更多，我也一一批驳，这下子就激怒了革命左派，便计划打击我的嚣张气焰，于是组织专场批斗。本来，其他人被揭发，不管是真是假，是有是无，都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开会时，都主动到台上去，跪下来接受批判，有的人跪得两膝发肿。有的人“罪行”不大，认罪态度好，向革命左派求饶，跪了几次也会被宽恕，再开会便有可能被通知不必上台罚跪，但他（她）们必须积极揭发批斗其他“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一旦被“解放”，斗争他人比左派更凶狠，甚至上台打人，以表示自己坚决革命的立场。革命“左派”们的心似乎和正常人不同，他们会在“反动学生”脖子上挂几块砖，有的用细铁丝系砖挂在“反动学生”脖子上，脖子被勒出血来。有的把尿桶挂在“反动学生”脖子上。有的人（其实当时都是小孩子，最大不超过20岁）被批斗到晚，会后又被绑起来，吊在屋梁上，吊了一夜，第二天被放下来时，已奄奄一息。稍事休息，又要接受批斗，但态度都很老实，决不反抗。革命左派们第一次遇我这个反抗者，大为惊奇、恼火，便要强行拉我上台接受批斗。我当时年龄最小，力气最小，但个子很高。我一生不喜欢人侮辱我，“士可杀不可辱”。11岁便闯荡江湖，读了很多武侠小说和儒家的著作，而且在我看到别人跪在台上时，我想如果是我，宁死不屈，于是在这关键时刻，是要人格，还是要性命，我断然选取前者。于是我拖起自己坐的板凳便打过去……这一打，十分有效，大家知道我不要命了。要命的怕不要命的，一大群人都吓得乱叫，一下子全跑光了，大喊“陈传席杀人了”。批斗大会便散了。很多人集合起来去公安局强烈要求正式逮捕我。我当时泰然自若，一个人信步走到花园里的几棵大树下，静静地想，如果他们不跑，我肯定会打死人，那么我会被判处死刑。现在，我顶多会被逮捕……事已发生，随它去吧。在这个时候，我

什么都不想，宁静地欣赏美丽的花朵，绿色的树叶，看看蓝天，望望白云（在以后几十年生涯中，在最危险、最紧急、最慌乱的时刻，也是我最安静的、最轻松的时刻，或看看花，看看云，或背几首唐诗等等）。谁知当时公安局接到上级通知，运动期间，不准抓人。以后的批斗大会则主要针对我，我作为被批斗的对象，不但不上台，手中还拿着棍，这恐怕是“文革”中唯一的现象。而且很多人喊口号只能喊“打倒陈传席”。至于当时常喊的“砸烂×××狗头”，“×××必须低头认罪”之类的侮辱人格的口号也不敢喊，否则我的大棍便会打过去。他们喊口号，我则高唱“三九严寒何所惧”。后来县委派一重要领导人组织批判我，但怕死是这些人的本性，仍没有人敢拉我上台。这位县委领导人十分恼火，责训这批人无能。而跟随这位领导人来的另一个领导人也十分害怕。他得知我“吃软不吃硬，欺强而不凌弱”。便委婉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讲了很多好话，求我上台。我心肠软了，答应上台。但当他叫我把棍扔掉时，我断然拒绝。我知道一旦我把棍扔掉，他们就会上去很多人，把我按倒。后来我拿着棍上台接受批斗，这也是全国仅有的现象。我用棍东指西指，好像是一个会议主持者。后来我被内定为敌我矛盾，判处20年徒刑，送去劳改。此后我受了很多苦，挨打是常事。我当时才十几岁，被迫挑水，肩都磨烂了，至今留有深重的疤痕。后来我忍受不了，夜晚，趁看守已睡，便跳窗逃跑了。仅逃跑这段经历，便可写一部小说，这还是留在以后再写吧。我受了无穷苦处。有一天，我躲到山沟里，观看夕阳将落，凉意逼人，想到自己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皆缘于几首诗词，便发誓再也不写诗了。后来偶尔又写了一些，写完就烧。但画画这一项我从来不想专门从事的技艺却帮了我很多忙……“文革”后期，我先上山，后下乡，又被推荐去上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淮北煤矿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业余画画，也出了不少风头。但那时，“文革”尚未彻底结束，人无法用自己的能力或才力铺垫自己的将来，前途十分渺茫。年龄一天天增长，却找不到出路，精神十分痛苦，总感到生而无趣，死又无益。画能排除闷气和闲气以及轻微的苦恼，但无法去除巨大而深沉的痛苦，诗

和古文都胜过绘画。加之当时条件限制，而且我从来也不想以画为终身职业，所以，也只是随便画画，更多时间耽于读书，包括读一些绘画理论书。那时候，全国刊物太少，发表作品十分困难，我不但发表过文学作品，也发表过绘画作品。

“四人帮”倒台后，一切都恢复生机。1979年，煤炭工业部在全国选拔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大约20人），培训外语，准备出国。我在完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考试，考英语、数学、机械、电等。结果考上了，到淮南煤炭学院学习日语。离开煤矿再看煤矿，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我已决计另择职业，古典文学和绘画都不能抛弃，这就是美术史。而且我读过很多美术史著作，都不太满意，很想写出一本新的《中国美术史》。当年只有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招收美术史研究生，而且只招一名（后来扩大到三名）。我离开淮南煤炭学院便来投考美术史研究生。那时我已29岁了，读研究生期间，我抓紧读书，做研究，并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古代美术遗迹。当时，电视放映审判江青等“四人帮”那样重要的新闻，我都不看，现在想起来也十分后悔。我后来出版的《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等几部著作，都是研究生期间写的。论文答辩时，我是唯一获得优秀论文的研究生。

1982年，研究生毕业，我被分配到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一上任，我就组织中国美术界美术史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明清绘画联展。大会如期在1984年5月召开，由我联系并邀请来的欧、美、日、澳等世界很多国家美术史学者以及中国的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当时台湾学者还不能直接到大陆，都绕道美国再来大陆）也都如期到会。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广州、沈阳等全国36家博物馆院及文博机构的明清绘画精品也如期在合肥安徽省博物馆联展。欧美学者认为，这样大型的联展在欧美是根本办不到的。美国杰出的教授李铸晋、高居翰等人也一直认为，安徽的研讨会之后，任何一次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都赶不上安徽那一次，规模之大，作品之全，后来皆无可比拟。会后，我将《黄山诸画派文集》编好交上海人美出版，然后就到了扬州。扬州的吃住

皆佳，找一安静的地方，整理我读研究生期间研究的《六朝画论研究》和《中国山水画史》二书。因为躲在扬州，干扰较小，这期间发表不少学术性论文，引起国内外同行的注意。《六朝画论研究》出版后，美国杰出的美术史教授李铸晋先生便推荐我到堪萨斯大学任研究员，寄来了聘请书、邀请函及各类资金保证书等等。这时，国内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准备调我，并派人来和我协商，南京师大也在努力调我回校任教。当时出国非常困难，校方答应帮助我办理出国手续，我就回到南师大。我当时太天真，缺少社会经验，应该叫他们把我房子找好，出国手续办好，我再调回。当时他们为了调我回去，我提出任何条件，只要他们能办到，他们都会马上办。但我没提。回去以后，房子也没有，东西堆在学生宿舍里，出国手续也没人过问。我对照文件，我的手续齐备，百分之百的符合出国条件，但当局就是不批。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天天跑去讲道理，但无人理会。美国方面连机票都寄来了，我拿给官儿看，他们无动于衷。我已失望了，绝望了。后来一位老干部同情我，说：“你真是书呆子……”她拨了一个电话，叫我再去一趟。果然，第二天就批下来了。我当时绝对愣住了，感叹很久，一直到今天。

1986年到了美国，才第一次了解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我在堪萨斯大学任研究员，研究明末清初中国画史和“扬州八怪”。美术史方面的资料，美国差不多都有，而且比在中国利用起来方便得多，至于中国大陆之外的资料就比大陆上多得多了。美国很多博物馆也都收藏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取出观看研究都比在中国方便得多。美国是私有制国家，大学、博物馆差不多都是私人的，但却向全社会开放，虽私而为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学、博物院都是公家的（国家的），但除了馆长之外，其他人要去看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要交钱。除了在堪萨斯大学做研究工作之外，我又参加很多重要会议，甚至国际教育会议也请我去讲演中国的教育特色，当我讲到中国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美国人都十分惊讶：共产党也知道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吗？我还在为全美（五十州）红楼梦研究会讲演了《红楼梦》研究。当然，更